

ပါ အမေရ က ရ မ စ သ ဖ ူ ပ ေ မ

张民 著

思想 教育 论

中南大学出版社

思 想 教 育 论

张 民著

中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思想教育论

张 民著

责任编辑：何彩章

出版发行：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829482

电子邮件：csucbs@public.cs.hn.cn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沙市科技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开 **印张：**11.625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100

书号：ISBN 7-81061-471-1/Z·030

定价：19.8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思想教育论》一书，汇集了我大学毕业 16 年来所写的 30 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大体上反映了本人的工作经历和学术历程。书的前半部分文章多是近几年在省委机关工作中所作，书的后半部分文章多在高校工作 10 年里（含攻读硕士学位的 3 年）所撰。这些论文虽经发表，但为了总结自己理论学习之得失，检讨自己理性思维之不足，交流社科研究之心得，我还是冒昧结集出版了。在此，诚请读者不吝赐教。

一般而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学术性论文。这类文章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思辩性和逻辑性，对某一门学科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奠基作用，对提高民族思维能力、塑造民族性格具有重要价值。一个人一生中能有一两个重要发现，有一二篇这样的论文就算不错了；如果有十几个或几十个崭新的观点就称得上“天才”了。第二层次是应用性论文。这类文章在理性思维程度上显然不如第一层次的文章，但它因善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而对实践具有指导、规范意义，或将实践经验、

感受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发现真理，往往显示出经世济用的巨大魅力。这类文章的数量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是最多的。第三层次的文章是实用性文章。一般包括调查报告、工作报告、经验总结和大事述评等。这类文章贴近社会生活和工作实践，面对社会大众或有关人员，因而显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毋庸置疑，无论是哪一类文章，都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都需要作者付出辛勤的劳动和高超的智力。如果企图以一种文章的意义去否定另一种文章的价值，那就是“文人自恋”了。我认为，这本集子收录的文章均属于第二层次的论文。如果有人认为某文章称得上第一层次的论文，我就感到欣慰了。当然，对自己近几年写过的属于第三层次的实用性文章，我也情有独钟，只是囿于篇数太少而不便结集出版罢了。

16年来，在紧张的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我还参与了一些书稿的写作。担任过正、副主编角色的论著有：《腐败与反腐败概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生人际交往指南》、《21世纪财经人才形象设计》、《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国民素质论》、《道德建设工程》、《心理素质培育》等。在这每一本书中，我都承担过一章的写作任务，还参与过统稿和校对工作。虽不能说自己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但也算尽到了一个思想政治

工作者的绵薄之力。

作为共和国的第四代人，我们学习和工作在改革开放年代，由于没有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纠缠，没有经受过民族存亡的考验，往往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学理性，极易染上急功近利的市场属性。尽管我总想追求学术上的创新和人格上的完善，总希望以理想主义态度处世，但终究摆脱不了世俗生活的羁绊，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索不是浅尝辄止，就是半途而废；对许多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不是眼高手低，就是不敢涉足。虽说有点“学术成果”，但毕竟难成“气候”。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内心深处感谢我的老师、学友和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们。

张 民

2001年12月于长沙蓉园

目 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1)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13)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大价值	(18)
社会主义本质论——价值与科学的融合	(26)
关于农村稳定与农村发展	(43)
发展市场经济与反腐败斗争	(61)
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的区别和联系	(73)
论道德的重要价值	(8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意义	(86)
论公平	(101)
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内容	(114)
现代企业的自组织特性与国有企业的改革	(129)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多元性	(143)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评析	(167)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观的误区	(185)
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99)
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212)

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226)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误区	(235)
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灌输”原则的必要性	(253)
分层次教育的依据与措施	(262)
市场经济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269)
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念的正确导向	(285)
论大学生素质的结构和培养	(295)
加强心理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	(304)
论大学生的社会化	(308)
大学环境与中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区别	(320)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歧变	(330)
必须坚持校园文化的政治导向	(338)
高校学风建设须从新生抓起	(346)
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当代大学生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35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诞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内，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立幸福生活指明了正确道路，也使理论本身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既是中国人民发挥历史自觉性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更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被接受的必然性。只有从源头开始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足迹，才能弄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在一个民族广泛传播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接受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和传播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

其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救亡图存。关心国事民瘼的知识分子从爱国、治国的立场出发，在西方文化思潮中，急切地寻觅各种政治方案，然而这些政治方案均在斗争实践中败下阵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反复推敲、比较，终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外御列强，内建强国。

其二，具有优良品质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已有200万工业无产阶级，与全国当时四亿人口相比，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但中国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优点：一是很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

的铁路、矿山、纺织、面粉、海运、造船等部门的大企业，这就使得无产阶级易于联合团结，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二是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特别坚决、勇敢。这两大优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能被中国迅速接受。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由小变大，并逐步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其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的反封建意识，虽然它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但对于解放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受其鼓舞，坚定探索真理的步伐，经过空想社会主义的桥梁，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国际条件。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使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从这次大战中看出，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从而对资本主义产生了种种怀疑。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公然拒绝中国提出的收回青岛等正当要求，无疑给中国人民浇了一盆冷水，促使中国人民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与此同

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极其重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撒下了“星星之火”，后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广泛传播的必然性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有着一定的一致性或契合机制，而这种一致性或契合机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理想”就是始于孔子、后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发挥而又积沉为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大同”理想。应当承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所谓的一致性或契合机制，而是对“大同”理想的“扬弃”和超越。与其说这种“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近代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不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思想障碍。

其实，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并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利”。在西方类似于“大同”理想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流传了几百年：从莫尔的“乌托邦”、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再到 19 世纪上半叶西欧“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西欧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有一定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批判地汲取了西欧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特别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中的合理之处，但这种合理之处一旦纳入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就不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了，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熟悉国际共运史就不难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一生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各式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无情揭露和批判。因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形成的“抗力”严重扭曲了科学理论本身，给刚刚形成的工业无

产阶级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从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传播发展过程，也是同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

既然不能从西欧文化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推导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有一定的“一致性”，进而把这种所谓的“一致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那么，把所谓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致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当然就是不科学的了。实际上，在五四前后，流传到中国社会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且有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诸如施蒂纳、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民粹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社会改造思潮”等。如果按照一些人的逻辑推导下去，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追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一致性”，而且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都有一定的“一致性”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主义”呢？由此看来，不能将这种所谓的“一致性”或“契合机

制”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确、全面的理解，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产生了许多困难。直至今日，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心理基础的小农经济文化心态，仍和其他封建主义残余深深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往往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紧密纠缠在一起。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心理因素的研究，要作系统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作“线性”的简单连接，即把“广泛传播”与某种文化现象简单地对接起来。事实上，中国传统文中的“大同”理想在近代经过《天朝田亩制》和《大同书》的两次诠释，已被历史发展击得粉碎。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就企求用一种既超越小农经济理想又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新文化价值观念来填补理想和信念上的真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文化心态相契合，也与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地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的文化心态相契合。正如我国学者叶险明所指出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心理中对“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才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根源。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指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后者只能产生和发展于前者的过程之中，或者说，后者只能是前者的逻辑结果。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根本路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从逻辑角度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这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去论证。一方面，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性，即能否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较好地解决了两个构成要素的“对接”问题，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逻辑规定。

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或外来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虽然是用德国的辩证法去批判“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结果，但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包括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和全球性文化底蕴，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既然如此，它对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指导意义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并不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普适性，更是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来看，它不是任何别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立